



清末民初的 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

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A Study of Lithography and Lithographed book in
Shanghai Area in the 1840s-1920s

杨丽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末民初的 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

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A Study of Lithography and Lithographed book in
Shanghai Area in the 1840s-1920s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 杨丽莹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325-8843-5

I. ①清… II. ①杨… III. ①平版印刷—印刷史—研究—上海—清后期 IV. ①TS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3322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
——以上海地区为中心
杨丽莹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7-5325-8843-5

G·679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TQ00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中国一向有重视古籍的传统,自宋代雕板印刷业大兴以来,历代版刻书籍就成为私人与公家收藏的重要对象。晚明清代以降,收藏之风大盛,宋元版本成居奇之物,下及清季民初,即万历以前之明版本亦视为珍罕之物。时至今日,自然连康熙版本亦是拍卖良品矣。但平心而论,研究历史文化,自然需要古书旧版,但若研究近代以来之历史变迁,尤其是西学新学一路,则石印书籍断不可忽视,甚至要大加重视。石印术乃自西方传来,制版印刷便利且成本低廉,适于大量生产,有利于大众传播,所以晚清以来传统的科举用书与时新的西学与传教书籍无不借之以流行。上海成为晚清中国与北京并驾齐驱的另一文化中心,正有赖于新式印刷术的传播,而其间石印业数十年的兴盛历史应该有人加以研究与总结,才能组成一部完整的印刷出版史。

杨丽莹博士期间师从陈正宏先生研究古籍版本之学,博士论文选题以扫叶山房为对象,对清代以至民国的一个重要印刷机构作了详尽的研究。晚清民国之际,扫叶山房也加入石印大潮,出版了许多石印书籍。循此路径而行,杨丽莹在博士后期间,即以人所忽视的石印业为对象,对晚清民国之际的石印历史作了详尽的研究,写出一份关于石印业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本书即在这份报告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由于晚清民初的历史是我所注重的旁门,因此我对石印书籍与报刊历来颇加注意,也搜集了一些稀见的传教士印刷品,进而对石印业在中国的由来与发展发生了兴趣。杨丽莹这本书正可满足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对石印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所需,是以在此略赘数语予以推荐。末了,还可加上一条信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就有人注意到石印业已成历史,石印书价格低廉,因此从中国市场上大量席卷而

去,以至于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库予以存贮。在今天的中国市场,石印书仍不值钱,但这些书籍所反映的时代脉络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段,也因此我们对石印业的兴盛衰落史有必要投以一瞥,本书值得重视的意义即在于此。

周振鹤

2018年7月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石印术的传入与石印本的诞生	11
第一节 西方石印术的发明与特点	11
第二节 石印术在中国的传入与接受	22
第三节 照相石印法在上海的传入与利用	29
第二章 石印术与上海石印业的发展	41
第一节 上海石印业之初兴	42
第二节 上海石印业之兴盛	50
第三节 上海石印业之存续	61
第三章 石印术与传统典籍的保存	74
第一节 经史典籍的影印与翻印	75
第二节 子部书籍的影印与翻印	84
第三节 集部文献的影印与翻印	92
第四节 传统典籍的石印本特点	97
第四章 石印术与通俗文学的繁荣	105
第一节 石印弹词、鼓词的盛行	105

第二节 石印本小说的繁荣	115
第三节 石印术对清末民初通俗文学发展的影响	124
第五章 石印术与新学书籍的传播	132
第一节 石印术与西学书籍的汇辑	132
第二节 石印术与新式教科书的编辑	141
第三节 线装石印本与洋装铅印本	147
石印本：用西术印刷的线装书	156
附录	161
附录一 石印术发展纪年表	161
附录二 清末民初上海民营书局名录	168
附录三 清末民初主要石印书局书目	202
参考文献	237
只是为了忘却(代后记)	244

引言

在西方铅、石印技术传入之前,中国的书籍出版以雕版印刷为主要技术手段。从目前所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的印刷时间^①开始至十九世纪初的清代末期,雕版印刷术在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技术与工艺日渐成熟。此时,西方的铅、石印技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了中国。

西方的铅印技术,是十五世纪中期由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一种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十一世纪初,中国的毕昇就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此后,民间和官方都有过活字印刷的经历,其中包括木活字、铜活字、泥活字、锡活字等等。中国人使用的活字与铅活字印刷技术只是铸造活字材料的不同,在印刷原理和工艺上并没有大的区别。而石印技术,是一种与活字、雕版印刷完全不同性质的化学印刷术。这一技术,发明于十九世纪初,由捷克人塞内菲尔德在德国慕尼黑发明。姑且不论石印术的原理和工艺,就“化学”一词,对于十九世纪(按:化学一词于十九世纪中期才发明)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新鲜的。因此,石印术刚传入中国时被当时人称之为“泰西新法”。这种泰西新法约于十九世纪中传入,在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曾一度取代雕版印刷,成为当时出版业的主流技术。这一技术的传入可以说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次西学东渐,在清末民初的中文书籍出版印刷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

自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石印术与石印本的研究,主要在印刷技术史和出版史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

首先,在印刷技术史的层面上,学界对于石印术传入时间的考察最为详

① 目前最早发现的中文雕版印刷品是唐咸通九年(868)刻《金刚经》。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说法不一,但大体时间基本可确定为公元九世纪左右。详情可参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8—10。

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台湾地区学者苏精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①。该书对石印术的传入时间以及早期石印中文书籍的印刷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其中利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回忆录和伦敦教会方面的档案资料,考订早在1823年左右(时为中国道光皇帝在位初期),马礼逊已将德国人发明的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并对早期中文石印的发展做了详细的梳理,注意到了石印技术长于印刷图画方面的特点。1985年,著名印刷史研究专家张秀民曾发表了《石印术道光时期即已传入我国说》^②一文。但是,张秀民根据《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的记载,推测石印技术是由英国传教麦都思于1830年左右传入中国^③。2008年,韩琦在增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一书时,对石印术的传入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和补充^④。值得注意的是,韩琦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石印术在道光年间已经传入,但是为什么过了四十多年才在上海被广泛使用。他推测主要原因在于石印技术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没有在民间得到利用。关于这一问题,吴丽雯在《清末民初石版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发展及其影响》^⑤一文中指出,光绪年间在上海迅速发展的石印出版业与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石印术并非一脉相承。石印技术发明以后,不断被改进,因而存在着不同的制版方法。该论文着重从技术层面上,对石印技术的各种方法进行了概念上的厘清,提出了道光年间传入中国的石印术是最早由捷克人发明的手工石印法,而光绪间在上海被广泛运用的是1859年发明的照相石印法。不过,该论文没有对两种方法印刷出来的实物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特点。为什么手写石印法在道光年间已经传入,但却没有得到充分和广泛的利用?而约发明于咸丰九年(1859)年的照相石印法在传入不久之后就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和发展?这是我们理解照相石印术被清人接受并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对石印术的传入和发展概况更为关注,对上述关键问题还没有加以特别的关注和研究。这正是本书想要关注和补充探讨的一个问题。

其次,在出版史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上海石印业的发展概况的调查与梳理上。早期的研究成果以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为代表。

①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

② 此文载《文献》1983年第4期,页237—238。

③ 此文后来收入了张秀民1989年出版的《中国印刷史》。

④ 补充部分基于韩琦于1990年发表的《清朝之石印术》(载《印刷科技》1990年第7期)和《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载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⑤ 吴丽雯《清末民初石版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发展及其影响》,台湾淡江大学1998年硕士论文。

该书对上海石印业的发展概况做了简单的梳理,收录上海石印出版机构 30 家,并对当时著名的石印机构点石斋的情况做了相对详细的介绍。此后,国内凡涉及石印出版的论文多以该书的研究为基础。《上海出版志》、《中国印刷史》、《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等等,均在张秀民的研究基础上对上海石印业的发展概况上有所拓展。但是这些通史性质的著作,大多集中在对史料的梳理,较少关注石印业背后的发展细节。近年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古登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主义 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 - 1937*)一书,对上海石印业的考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该书提出了三个概念: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并从这三个概念出发考察了 1876 至 1937 中国的出版印刷。其中第三章“石印的黄金时代”,对石印业在上海的发展概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指出了中国石印出版与西方石印出版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地方,并对上海石印业早期的代表点石斋、同文书局、蜚英馆进行了重点考察与分析。该书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从出版业资本的运用、雇用工人的数量来考察石印业的发展,并得出结论:石印出版是中国传统印刷文化和商业向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到西方机械化印刷术演变的过渡^①。不过,此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民国以后的铅印出版业,石印业只是其考察铅印业的参照对象,而且对上海石印业的考察也集中在光绪二十年(1894)之前的印刷机构。2014 年,复旦大学许静波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 1843—1956》^②一书。是书以上海石印书业为研究对象,详细梳理了 1878 年至 1956 年间上海石印书业的发端、兴盛、转型至终结的过程,并利用上海书业公会的档案材料,重点对民国以后石印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冯绍霆的《档案中所见清末书业》^③、潘建国的《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清末小说》^④、汪耀华的《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⑤等研究成果都通过利用和整理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的档案,为上海

①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 - 1937*, UBC Press, 2004。本书所有关于该书的引文均为本人自行翻译,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② 许静波《石头记: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 1843—19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年。其论文题名为《成本最简模式下的近代化——上海近代石印书业研究》,复旦大学 2012 年博士论文。

③ 冯绍霆《档案中所见清末书业》,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 年,页 1035。

④ 潘建国《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清末小说》,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后出站报告,2002 年。

⑤ 汪耀华《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史料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年。

石印业的发展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一些量化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主要提供的是关于一个行业发展的商业性质方面的信息,而关于书籍内容以及文化层面的信息极少涉及。

上述研究成果基本属于印刷史、出版史的范畴,而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关于石印本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书目整理上。有不少清末民初的书籍研究者对各自研究领域的书籍做了大量的书目搜集工作,编成了系列与石印本有关的书目。在通俗文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收录石印书籍的专科目录,如阿英的《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①、日本学者丸山浩明的《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②;另如《中国鼓词总目》^③一书收录了大量石印鼓词书目,编纂者在前言中还将“石印鼓词”作为一种概念提出。周振鹤的《晚清营业书目》^④、王清原的《小说书坊录》^⑤等这些以出版销售机构为主体所编的书目中也收录了大量的石印书目。从版本学层面上,对石印本的进行整体性探讨的研究,主要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发表在《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第2期的苏铁戈《漫话中国的石印本书籍》,《图书馆论坛》1998年第2期的李培文《石印与石印本》,《文献》2003年第2期的苏晓君《石印脞说》,这三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图书馆界的研究人员,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到了石印本印刷特点的一些复杂性,因此,大多从鉴别的角度对石印本的版本特点作了简单的归纳。这些是关于石印本特征的概况性研究成果,而关于石印本的个案研究,则散见于西学书籍、通俗文学诸如弹词、宝卷等个案研究中,如俄罗斯学者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石印宝卷的实物调查研究^⑥。

(二)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认为关于石印术与石印本在中国的发

-
- ① 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初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后收入《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1989年,页126。
 - ② [日]丸山浩明《中国石印版小说目录(稿)》,载《广岛女子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纪要》第7号,1999年。
 - ③ 李魏等编著《中国鼓词总目》,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
 - ④ 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 ⑤ 王清原《小说书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 ⑥ Rostislav Berezkin, *The Lithographic Pri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ojuan Genre in Shanghai in the 1900-1920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Print Technolog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上海二十世纪十至二十年代石印出版业的发展与宝卷文学形式的变迁:出版业与中国俗文学发展的关系), *Chongcheng University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 2011 (cumulative 17): pp 337-368。

展研究,还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进一步探讨。

首先,对石印书局和石印出版物的微观考察有待拓展。上述许多研究集中对石印业的发展进行概况性的梳理,缺少对个案和实物的研究,而且在对石印书局的个案考察中,点石斋、同文书局、扫叶山房是最常被关注的对象。这三家出版机构,一个由英商投资开办,一个由中国买办商人创设,一个则是由传统雕版印刷业转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但较少有研究者关注这样的对比。同时,在清末民初的上海,至少有近三百家的书局使用过石印技术,这些机构中有多少和这三家是相同类型的?是否还有其他类型?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他们的出版物之间有哪些共同点?以及这些出版物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张仲民在《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一书中提到潘光哲教授建议学者们一个一个报纸、杂志、书局来作研究,积少成多;这样,我们就慢慢会对清末的出版市场、文化市场有比较清楚的了解^①。

其次,对石印书籍实物应该进行更为深入和细微的考察。尽管目前关于石印书目的整理成果比较丰富,但整理的成果,已是二次文献。它只能提示我们书籍实物的存在,提供我们按图索骥的方位,并不能直接反映石印技术和出版物的特点。它们是不是可靠而有序的史料依据,需要对实物进行调查才能确证。比如,在许多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些石印书籍的出版时间竟然早于石印术的传入^②。通过实物调查,可以发现这是由于照相石印技术对原本的完整复制而造成的误解。无论研究印刷技术史还是出版史,印刷出版物本身是最能反映其特点的原始资料。如果仅仅利用这些书目的数据,而忽略对书籍实物本身的考察,得出来的研究结果是有待商榷的。又如,在目前关于点石斋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多关注《点石斋画报》及其图画类书籍的石印,很少提及点石斋的其他石印出版物。事实上,图画类书籍只是其早期出版物的代表之一。自光绪五年(1879)开始至清末,点石斋石印出版书籍有上百种,仅对一两种出版物加以考察是很难窥见其全貌的。相反,俄罗斯学者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的研究,着重对石印宝卷实物进行分析与比对,发现采用石印技术之后的宝卷在生产销售模式等方面产生了一些变化,但仍然在宗教性方面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特征。他认为这些传统特

① 张仲民《阅读、表达与集体心态》,2007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② 此外,还有作者和文本方面的错误,这些情况是无法通过目录获得的。如《复古编》光绪十三年积山书局石印本,经有关研究者校对考订,并非由北宋张有编,实际上是由元末明初人增订的另一个本子,参见王珏《石印本〈复古编〉非北宋张有撰考辨》,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9期,页61。

征的保护阻碍了现代化和世俗化文明的进程^①。这与石印术对于西学传播的促进作用是不太一致的。因此,我们只有对石印本的个案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才能对石印术在中国的发展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第三,对石印术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应该从多个角度加以全面考察。比如,对于石印术在中国的衰落,多数研究者认为科举制度的废止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有上千年的历史,科举应试读物也一直是雕版印刷业的重点。石印术传入以后,也被广泛用于如各种流行的通俗文学、西学以及报纸的出版。在小说、西学、画报等出版史的研究当中,石印术对上述书籍的出版所起的推动作用也被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而这些出版物的流行,如画报等,与科举制度之废止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科举之改革与废止,则更应该刺激小说和西学书籍的出版。光凭这一点,科举的废止并不构成石印业存续之绝对因素。吴丽雯的论文统计了从光绪七年(1881)至1954年间用石印出版的丛书有174种,其中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之后出版的就有131种。这一数字说明石印书籍在科举废除之后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拙作《扫叶山房史研究》曾统计清代书坊扫叶山房在科举废除前出版的石印古籍有103种,废科举之后至民国七年(1918)间出版的石印古籍多达五百多种。这些数字虽然并不能代表整个石印业的发展,但是,仍然可以说明在科举废除之后,石印业并没有一落千丈。

徐雁平在《石印出版与晚清的科举、文化》^②一文中指出应从科举改革到科举废止这一个过程来考察其对于石印出版的影响,这是一个过程性而非瞬间性的影响。而日本学者泷井孝三发表于1985年的《石印本の历史の一斑について》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废科举之后石印本反而更为盛行。因为石印术需要合适的原稿书写人员,而科举制废除后出现了大量从政失败的文人,从而满足了石印业对原稿书写人员的需求^③。可惜该文篇幅非常短小,一笔带过,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泷井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视角,那就是在考察石印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除了对石印技术本身、生产出来的石印本进行考察,还应该对技术的使用者、参与生产者等进行调查。

① Rostislav Berezkin, *The Lithographic Pri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ojuan Genre in Shanghai in the 1900-1920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Print Technolog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② 徐雁平《石印出版与晚清的科举、文化》,载《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2014年第1期,页26—60。

③ [日] 泷井孝三《石印本の历史の一斑について》,载《书志学》1981年第26号,页24—26。

第四,无论是基于印刷史、出版史还是文献学层面的研究,目前的大多数研究论著主要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与发展,而较少关注石印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传统雕版印刷技术以及民间坊刻业的关系。在铅、石印术传入之前,雕版技术和雕版印刷业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传教士们在其他国家推广西方印刷术时非常顺利,在中国就遇到了不同的情形:“传教士抵华时,印刷已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活字的问世也已七百余年,更重要的是主流的木刻版印在中国社会畅行无阻。”^①石印术在传入中国时才发明了三十年,西方的石印业也才刚发展起来。这一尚未成熟的西方印刷术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印刷术相遇,其本身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行业在遇到西方新技术时,会不会发生冲突?如果有,在新旧交替的冲突中他们是如何保存传统、保护自身利益的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对西方技术传入前中国的印刷业乃至印刷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不能孤立地考察石印术在上海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事物在发生变化时,除了外部的刺激,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一定的动因。除非它只是外部形式的更新,在本质上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当然,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芮哲非和韩琦等在相关论著中指出石印业在光绪中得以迅速发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清内府武英殿的大火导致大量书籍被毁,市场上出现了大量重印这些书籍的需求。但是,这一原因是不是关键原因?在当时,有哪些书籍被重新印刷?为什么它们会被重新印刷?它们在重印时,形式上是否有重新设计?文本是否发生了改变?如果有改变,这些改变在时间上是否有特殊性,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是否有关联?这些问题是我们理解石印术流行于清末民初的一些关键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对石印本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三)

在人类印刷技术的发展史上,无论是西方与东方,每一次印刷技术的革命,似乎都带来一系列文化上的变革。石印技术传入之时,在画报和通俗文学的出版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陈平原甚至认为石印术的引进,对于中国画报之崛起,是生死攸关的^②。有关西学、清末小说的研究,都曾试图说明,石印术的传入对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的产生起着积极的作用。正如费夫贺在《印刷书的诞生》中所说的:

① 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自序。

② 陈平原《新闻与石印——〈点石斋画报〉之成立》,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页60—66。

我们试图厘清,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将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布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①。

不可否认,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对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否至关重要,还值得商榷。中国印刷史的发展特点,与西方印刷史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的不同。在中国,技术的变革对旧的和传统的变革是否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对此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察。钱存训曾提出,“印刷术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条件所促成。同时,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印刷术本身发展的趋向”,而这些“因素复杂,必对学术、思想、社会等各方面在印刷术使用以前和以后,多找证据,根据史实,深入分析和比较,才能作出一个全面的答案”^②。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研究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本书对于石印术与石印本进行研究,旨在通过书籍实物还原这一技术在历史上的真实面貌,然后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其价值。为还原这一真实面貌,必须对石印本的实物特征、版本源流加以全面考察。因此,本书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强调实物版本的比对,以及对不同印刷方法印刷出来的实物加以版本学概念上的厘清,以促进对技术本身、技术的使用者、技术产品,即石印术、石印业和石印本这三者的理解。本书是笔者在博士后出站报告《清末民初上海地区石印书籍出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修改扩充。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以石印技术为切入点,并强调石印技术与传统雕版印刷术的对比,专注于考察在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激荡下,印刷技术的变革对中国传统书籍出版的影响。

研究一段历史,时间的界定尤为困难。因为任何事物的变化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朝代更换了,也只是统治者的更换,人类社会的一切仍是上下连贯,并无突然的差异”^③,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石印术在中国的发展史,也很难以某一年或者某一历史事件作为断代的标志。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前言中所云:“强行将二者分离的结果,就是将清末一段孤立,而从把

① [法] 费夫贺、[法] 马尔坦著《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3—4。

② 参见钱存训为《中国印刷史》所作的序言,载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页12。